

中国史学

仓修良 主编

■ ZHONG GUO SHI XUE MING ZHU PING JIE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名著评介

第三卷

K092

3.2

仓修良

主编

92505

中国史学名著译介



200204386

周谷城题



鲁新登字2号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第三卷

仓修良 主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25印张 5插页 347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771—3,770

ISBN 7—5328—0853—X/K·25

定价 24.75 元

总



第一卷

尚 书
春秋与左传
国 语
战国策
史 记
汉 书
东观汉记
汉 纪
三国志
后汉纪
后汉书
华阳国志
宋 书
魏 书
梁书与陈书
北齐书
周 书
隋 书

晋 书
南史与北史
史 通
贞观政要
通 典
元和郡县图
志
唐会要
旧唐书与新
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第二卷

资治通鉴
通 志
续资治通鉴
长 编
三朝北盟会

编

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
通鉴纪事本
末
资治通鉴纲
目
文献通考
辽 史
金 史
宋 史
蒙古秘史
元 史
国 权
罪惟录
读通鉴论
明史纪事本
末
读史方輿纪

要	续、补、	科书
明儒学案	三编)	历代舆地图
宋元学案	夷氛闻记	清朝续文献
明史	朔方备乘	通考
十七史商榷	小腆纪年附	蒙兀儿史记
廿二史考异	考	新元史
廿二史劄记	中西纪事	中国历史研
续资治通鉴	明通鉴	究法及补
文史通义	湘军志	编
	东华录	中国近三百
第三卷	新学伪经考	年学术史
畴人传及其	日本国志	(附《清
续编	元史译文证	代学术概
圣武记	补	论》)
海国图志	大同书	古史新证
蒙古游牧记	中国古代史	中国文化史
碑传集(附	中国历史教	

DQ86/02

目 录

畴人传及其续编	张文建 (1)
圣武记	袁英光 (11)
海国图志	吴 泽 (31)
蒙古游牧记	宝日吉根 (59)
碑传集(附续、补、三编)	张承宗 (71)
夷氛闻记	胡逢祥 (99)
朔方备乘	杨余练 (115)
小腆纪年附考	邬国义 (135)
中西纪事	周朝民 (153)
明通鉴	袁英光 (169)
湘军志	祁龙威 (199)
东华录	罗 明 高 翔 (215)
新学伪经考	汤志钧 (225)
日本国志	盛邦和 (241)
元史译文证补	陈得芝 (269)
大同书	汤志钧 (279)
中国古代史	袁英光 (299)
中国历史教科书	袁英光 仲伟民 (325)
历代輿地图	李志庭 (349)

-
- 清朝续文献通考高翔 (365)
- 蒙兀儿史记余大钧 (377)
- 新元史余大钧 (399)
-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叶振华 (427)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清代学术
概论》）胡逢祥 (451)
- 古史新证谢维扬 (475)
- 中国文化史张文建 (499)

畴人传及其续编

张文建

(一)

《畴人传》是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家传记集。清阮元编纂。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晚号节性斋主人、研经老人等。江苏仪征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官至乾、嘉、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他既是一个大官僚，又是一个大学者。

阮元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阮承信因家道中落，失去了科举仕进的机会，30岁后补了国学生身份后，便闭户守贫了。阮元自幼接受封建传统教育，很大一部分学业是在其父母的教诲和指导下完成的，特别是阮承信经常为他讲《资治通鉴》等史书，告诫“读书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阮元《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研经常集二集》卷1）他23岁参加江南乡试，中式第八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第二次会试成功，获得了进士。乾隆五十六年（1791）大考时，被皇帝“亲擢第一，超擢少詹事”。从此后至46岁，他一直官运亨通，

曾历任山东、浙江学使，内阁学士，兵部、礼部、户部侍郎和浙江巡抚等职。嘉庆十四年（1809），因失察刘凤诰科场舞弊案被革去浙江巡抚职，改任编修，致力于国史馆《儒林传》的编纂工作。嘉庆十六年底（1811），阮元又时来运转，皇帝补授其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职。以后又历任漕运总督，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等职，最后升到体仁阁大学士这一显赫的官位。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因腿疾致仕回乡，随后“便怡志林泉，不与郡县相接”。（英杰修《读纂扬州府志》卷12）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写信给伊里布，请其代奏“联鸣制英”以夷制夷等方策，力主抵抗。道光二十九年（1849），阮元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前夕病逝，谥号“文达”。

（二）

在阮元生活的年代里，以考证古代经史为主要特征的汉学兴盛，地处生产、商业、交通发达地区的扬州更是人才济济，几出名师学者，形成了所谓的“扬州学派”。因此，阮元从少年起便有机会和这些学者交游。以后又陆续结识了汪中、钱大昕、王念孙、邵晋涵等汉学家，学业大有长进，其论学，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24岁时，他就写出了《考工记车制图解》一书，“为江永、戴震所未及发”。（阮亨《瀛舟笔谈》卷1）他在研究经史之学的同时，对自然科学也广泛地涉猎，接触到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著作，大考时所作《拟张衡天象赋》和眼镜诗，也表现出其自然科学的造诣，故乾隆皇帝召见阮元时，特别问起他“天文算法等事”。（《清史

稿·阮元传》)尤为可贵的是,阮元做官以后,仍保持了学者本色,并凭借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积极地提倡学术研究,振兴文教事业。他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培养人才。常罗致学者从事编书刊印工作,编纂《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撰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自称“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为保存、整理中国古代典籍和学术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阮元继承了顾炎武、戴震等人的某些学术思想,主张学者不应该“讳言食色而空言义理”,必须学习和研究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学。并强调经世济民的学问亦存于经史之内,“欲论经济,舍经史末由也”。(阮元《京师慈善寺新立顾亭林先生祠堂记》)他把经与史并重,相辅互成,“夫经述修治之原,史载治乱之迹。疏于《史》、《鉴》,虽经学文章,何以致用”。(阮元《己未会试策问》)他还说,熟读司马光《通鉴》,“则千古以来成败得失之故,洞若观火”(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由于他精通史学,故常认识到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后必胜于,人们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因时制宜,“以求合于天行”,适应变化了的时代需要,得出了“势穷者必变,情弊者务新”的历史变易观点。(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研经堂集三集》卷2)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也由传教士输入中国。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在朝廷的支持下,一批编译和介绍中西自然科学的书籍,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相继问世。虽然雍正朝以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西文化交流陷于停顿,但早先传入的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

和实验方法，却不可避免地学术界引起强烈的震波，一发而不可收。此外，由于汉学的兴起，人们也开始重视对于我国古代算学的研究和整理，并将此作为研究经学的工具和辅助知识。乾隆开四库馆后，经戴震等的发掘和纂辑，一些久已散失的古代数学著作重见天日，把人们在西学冲击下的自然科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阮元所说：“庶常以天文與地、声音、训诂诸大端，为治经之本，故所为步算诸书，类皆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准古作者，而又罔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者，用遗来学”。（《畴人传》卷42）阮元受到戴震等的影响，一方面研究社会科学，另一方面研究自然科学，视其为“实学”的一部分。他年轻时在博观史志，研求六经的同时，对于“中西异同，今古沿革，三统四分之术，小轮椭圆之法”，也旁稽载籍，博问通人，有所研究。认为，“数”乃六艺之一，是儒者必学的知识，“孰为儒者而可以不知数乎。”为官后，又曾管理过国子监算学事务，并为蒋友仁的《地球图说》作过补图。他在任漕运总督时，还立粮盘粮尺算捷法，较旧法节省一半时间，简便易行。他还在自己所办的书院内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并出有关中西天文算学理论的试题来考学生，促使他们积极地钻研自然科学。当时诂经精舍学生中“能习推步之学者不乏人”，为了表扬和选拔那些肯钻研的学生，就在浙江“以天文算学别为一科”，让“精于西人算术，通授时宪诸法，明于仪器”的人“握算就试”，如参与编纂《畴人传》的周治平，就是被阮元“特拔入学”后又送入诂经精舍深造的一位天文算学家。

综上所述，《畴人传》的编纂既是受到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影响的产物，也是阮元本人寻求经世济民

之学，发扬实事求是学风，顺应时代需要的表现。

(三)

《畴人传》46卷，成于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阮元自述其著书宗旨：“徒以象数之学，儒者所当务，爰肇自黄帝，迄于昭代。凡为此学者，人为立传，俾后来彦俊，知古今名公大儒从事于此者不少，庶几起其向慕之心，且缘是考求修改原流沿革条目，然后进而恭读圣制，或得有所领解，仰窥万一，此则辑录是编之大旨也”。（《畴人传·凡例》）全书按朝代编排而成，共选录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颇有成就的中国古代科学家243人，附西洋科学家37人，打破了学术上的国界，每人为作一传，首先介绍生平事迹；再阐述创造发明；重要人物传后间加评论。

《畴人传》开卷即解释了畴人的意思。畴，即辈也。世世相传之业，皆可当畴人，“是畴人传为名，义取诸此”。（《畴人传》卷首）第1卷从黄帝时的所谓“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写起，接着列举了上古、夏、商、周时期的大章、箕子和商高等17人，因资料缺乏，叙述得极其简略。卷2至卷4为两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有张苍、司马迁、刘向、刘歆、杨雄、贾逵、王充、张衡、蔡邕、何休等。卷5至11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家较多，有杜预、刘智、何承天、崔浩、刘徽、葛洪、祖冲之、刘焯等。卷11至卷17是隋唐时期，其中介绍一行的成就即占3卷。卷18记五代十国时期的科学家，由于此期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因此只写

了后晋的马重绩与后周的王朴。卷19至28写了宋、辽、金、元科学家王处纳、沈括、苏颂、秦九韶、杨辉、耶律楚材、郭守敬等，反映了这一时期科技兴盛的局面。卷29至34为明清时期，“推步之法，由疏渐密，至国朝而大备”。著名科学家有刘基、徐光启、潘圣樟、黄宗羲、阎若璩、江永等。对梅文鼎作了较详细的报道，占了3卷，说他从事天文历算研究六十余年，著书八十余种，其《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算学史。对戴震的叙述也较详，以表阮元的崇仰之心。卷43至46，“仿诸史传外国之例，凡古今西人别为卷第”。附西洋科学家哥白尼、欧几里得、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奈端、噶西尼、刻白尔等，通过他们的生平事迹和科技成就，用资博考“累经改易、派别支分、师傅各异”的西洋新法，特别介绍外国自然科学的传入中国。

阮元《畴人传》各卷篇末，大多有“论”，或阐述推究各家学说之原委流变；或分析比较各家学说之异同得失。皆言简意赅，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他自谦地说：“天学渊微，折衷非易，所愿与海内学人共审之者也”。（《畴人传》凡例）如评明末徐光启曰：“自利氏（即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畴人传》卷32徐光启论曰）评梅文鼎曰：“自徵君以来，通数学者后先辈出，而师之相传要皆本于梅氏，钱大昕目为国朝算学第一，夫何愧焉。”（《畴人传》卷38梅文鼎论曰）评戴震曰：“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畴人传》卷42戴震论曰）在如何对待西方自然科学方面，他承认“西人尚巧算，屡经实测修改，精务求精”，“于推步一

事，颇能深究”。（《续畴人传序》）有比中国天文算学家高明的地方，值得学习。特别是西方重视实验的方法和求实精神，更应吸收和借鉴，“唯求其是，而不先设存心”。他觉得中国科学家对实验重视不够，不注意利用仪器来实测，取得确切的数据，这是造成理论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因素。再加上明时理学家“空谈性命，不务实学”，更造成了中国天文算学落后甚至失传的情状，所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凭借其理论上的优势，趁“中法湮替之时”传入中国。由此又造成了另一不良倾向，“世人好异喜新，同声附合”，“每据今人之密而追咎古人，见西术之精而薄视中法。”（《畴人传》凡例）过分迷信西学，丧失了民族自尊心。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着的崇洋媚外现象，他说：“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云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畴人传》利玛窦传论）又说：“但可云明之算学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畴人传》徐光启传论）上述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

阮元著《畴人传》，立意“网罗今古，善善从长，融会中西，归于一是”。（《畴人传》凡例）但事实上，由于他阶级和认识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阮元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本能地害怕那些可能危及封建统治的西方科学理论，故他对维系封建统治的理论支柱——中学不免有夸大之词，而对西学则过分苛求，甚至予以排斥。如他认为西方的一些科学理论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法实窃于中国”，这显然是天朝至上的盲目自大心理在作怪。如他曾抓住西人对于“日

心说”论述不一的毛病，攻击哥白尼学说“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哥白尼学说主张地球动而太阳静，阮元把封建伦理道德的标准搬到自然界，自然会觉得哥白尼学说“上下易位，动静倒置”，是无法接受的。当然他的错误认识也是由于当时落后于西方的整个中国自然科学的状况所决定的。阮元本人亦感到自己对西方自然科学认识的矛盾和迷惘。他坦率地说：“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畴人传》蒋友仁传论）满足于直观的描述，不知其所以然，始终建立不起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这是封建学者在那个时代只能达到的水平。

《畴人传》所记，不仅重视诸家学说要旨，而且特详于天算仪器制度。对科学家创造发明的种种仪器，不厌其烦地加以具体描绘，认为这是“算造根本”。阮元著述态度严谨，史料皆注出处，“凡所用书目皆注于每篇之末，以便检阅，凡其人著作发明数学者，无论存佚未见一一详载”。（《畴人传》凡例）尤其剔除历代记载中的一些迷信谶纬，凡以星象占验吉凶或事涉荒诞者概不录。此外，《畴人传》涉猎愈深，搜罗愈广，“采录诸书二十四史而外，出于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为多，其余见闻所及，时有纂修”。（《畴人传》凡例）

阮元《畴人传》也有不足之处，如它的范围，大多仅限于天文算学方面，没有将其他方面的科学家包括进去。有的问题语焉不详，出现了不少空白。特别是书中的一些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观点，曾经束缚了相当一部人对西学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对后人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鸦片战争之后，象李善兰、王韬那样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思想的科学家在介绍西学

时，首先对阮元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

尽管如此，《畴人传》的学术价值还是较高的。正如阮元自己在序中所说：“综算氏之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谗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有志乎通天地大者，幸详而览焉”。后人诸可宝、华世芳则对阮元《畴人传》作出了如下评价：“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异同之致，掇拾史书，荟萃群籍，创为畴人传，自黄帝以降，甄而录之，得二百八十人，综算氏之大成，纪步天之正轨，至今游艺之士奉为南鍼”。（诸可宝《畴人传三编》卷3阮元论曰、华世芳《近代畴人著述记》）近年来台湾学者亦认为“阮元以汉学后劲，注意数学，他的《畴人传》虽表现其对近世数学所知甚近，然因其提倡，乃有道咸时代之数学风气，终有李善兰之成就”。（胡秋原《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肯定了《畴人传》对推动近代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

清道光年间，罗士琳撰《续畴人传》6卷，搜集前传所未收资料，仍采前书体例，补续44人，如宋代杨暉，金元好问，元蒋周、朱世傑、赵诚，清明安图、陈际新、张肱、孔广森、博启、许如兰、陈懋龄、钱大昕、凌廷堪、李璜、程瑶田等。阮元为之作序，统阮氏《畴人传》共成52卷。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本。

光绪十二年（1886），诸可宝撰《畴人传三编》7卷，仿阮、罗二书体例，专收清代学者，补遗总128人。其中著名人物有吴任臣、龚士燕、骆腾凤、张文虎、李善兰、周济、顾栋高、程恩泽、俞正燮、钱仪吉、朱骏声、冯桂芬、曾纪鸿等。《畴人传》及其续编的作者阮元、罗士琳也在其例。收录的西洋科学家有艾约瑟、伟烈亚力等15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黄钟骏撰《畴人传四编》12卷，则仿前三书体例，“荟萃简编，纲罗散失”，续补从上古到清朝的本国科学家275人，西洋科学家153人。西洋诸人传记材料多取自王韬辑录的《西学原始考》、《泰西著述考》、《西国天学源流》等著作。

上述四书虽非一时之作，但体例相同，内容衔接而不重复，且编撰的指导思想又基本一致，是不可多得的我国历代科技史资料汇编。有1898年《畴人传合刻四种》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55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